

# 偏见与傲慢 ——哈萨克斯坦抗疫实录

谢维宁

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 一、导言

今年6月底，我暂别阿拉木图，取道塔什干辗转回国。飞机在西安降落的瞬间，远远望见工作人员全副武装的白色身影，人便不自觉地长舒了一口气。我注意到连他们的手机都被套上了密封胶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阿拉木图儿童医院，问诊台的护士们只在和病人说话时才勉强用口罩遮住嘴巴，依然将鼻子完全暴露在外。那是5月的一天，街上下着大雨，天气莫名湿冷，然而她们呼出的热气却好似会灼人，逼得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即使不看数字也能猜到，哈萨克斯坦的疫情在今年愈发地严重了。4月底，室友独自前往首都努尔苏丹实习，为了避免感染，一路上她不吃不喝，而且始终戴着口罩。初到努尔苏丹时，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然而，检测结束后的第三、四天，她突然开始发烧、咳嗽，随即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得知消息后，我们都大感震惊。我和室友同住两年，深知她不是疏于防范的人，据她回忆，除了在检测

中心，自己并未在其它任何公共场所摘下过口罩。至今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她是在检测中心还是在其它场合不慎感染，但可以明确的是，3月，病毒已经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我们。

4月，学校负责外事管理的努尔兰老师全家感染，我又吃了一惊。努尔兰十分注重防疫，平时严格佩戴口罩，酒精不离手。疫情期间，他曾主动提出要给我们派送生活用品：“我先买好，喷上酒精消毒，放一天再给你们送过去。”饶是如此，他也没能抵抗住病毒的侵袭。事后听努尔兰的同事说，是他的孩子先感染了病毒，随即传染了全家人，好在他的妻小都是轻症患者，很快便痊愈了，他自己经过数日的住院治疗，也终于好转。

5月，我常去拜访的老奶奶一家也感染了。为了怕我担心，奶奶特意等到痊愈之后才告诉了我这件事情。电话里她言谈轻松，向我描述主任医师是如何关心她的病情，她又是如何携女儿女婿领着其它病友一起唱歌来抵抗病毒的。我一边感叹于她乐观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一边也感到困惑不解。老奶奶已经八十高龄，是阿拉木图最早的一批眼科医生、医学博士，且不说她因脊柱问题已经多年无法下楼，即使她能够出门，我也相信她的防疫措施一定是最为严格的。她常嘱咐我要用酒精消毒开门把手，还要用消毒水擦洗地板。她的女儿女婿也都是理科博士，按理说不应该疏于防范。后来老奶奶偶然提到在他们全家感染的前几天，她的女儿做了一个手术，曾多次进出医院。联想到疫情初期全哈的感染者中有高达20%的人都是医护工作者，我不禁怀疑老奶奶一家的感染源也来自医院。但由于哈国没有病毒溯源系统，我的怀疑至今无法被证实，只是偶尔静坐反思时，我的内心有着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现在想来，恪守防疫规则或者至少自认为严格防疫的人感染病毒并非没有原因。所谓的个人防护其实并不能由个人掌控，如果周围的人普遍认知错误并造成大范围感染，个人难免陷入十分被动的处境，病毒更是防不胜防。据统计，在总人口 1900 万的哈萨克斯坦，有超过 50 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可谓不严重。哈国如今的局面与普通民众对新冠疫情的偏见以及对科学防疫的傲慢有着直接关系。

## 二、识病毒雾里看花，偏听偏信

哈萨克斯坦的首例新冠确诊病例出现在 2020 年 3 月，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对疫情都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阿拉木图在 1、2 月期间甚至还出现了囤积口罩的浪潮。然而，随着第一例感染者的发现，民众仿佛听见靴子落地的声音，反而放松了警惕。现在回看，2020 年 3 月是哈国执行防疫最为严格的时期，或许正是由于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较少的感染病例以及过于“精准”的预测（哈国卫生部曾准确预测首例病毒出现的时间），普通民众产生了“政府只是在吓唬我，其实疫情并没有那么可怕”的错觉。疫情暴发初期，坊间甚至一度流传每日新增感染的报道只是政府用来骗取联合国援助的手段。

2020 年岁末，我在市中心阿拜大街上的一家商店购物。也许是因为店内商品大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店主很关心口岸重新开放的时间，忍不住和我多聊了几句。临走时，这位

年轻的姑娘突然问我：“你说这场疫情是真的吗？我看周围好像也没什么人感染。该不会是政府骗我们的吧？”像她这样对新冠病毒将信将疑的人并不少见。疫情期间我一直住在青年学者公寓，一次，我在厨房遇到了自己的邻居，一位地理学博士。她直言老家的亲戚“从来不戴口罩，哪怕当医生也是不戴的，一点事都没有”，让我不要担心。我从未想过会从一位理科博士的嘴里听到不用戴口罩的论调，为此还特意查阅了哈萨克斯坦的中学教科书，结果发现关于病毒特性（包括传播途径）的介绍赫然出现在七年级的生物学课本中，同时还配有人类历次大型传染病发生的时间表。该书出版于2017年，读罢，我只觉得讽刺。



图1 哈萨克斯坦中学教科书上关于病毒特性的介绍，指出了RNA和DNA病毒的区别，并通过图片向学生展示了各种病毒的基本结构  
图片来源：7年级生物课本 Atamura 出版社，2017版

此外，一些恪守防疫规则的人不幸感染了病毒，反过来又加深了周围的人对疫情的偏见。2020年夏末的一天傍晚，我在校园里偶遇了玛丽亚老师。玛丽亚在学校里讲授俄语，时常组织中国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疫情暴发后，大批中国学

生回国，留在阿拉木图的中国学生也找各种借口推脱，避免参加集体活动。然而，玛丽亚的工作量却不减，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给来自土库曼斯坦等其它国家的留学生讲解校园里各种设施的俄语说法。注意到她和她的学生都没有戴口罩时，我心中开始打鼓，正盘算着如何远远地打个招呼就快速离开，谁知热情的玛丽亚冲上来就要和我拥抱。见我动作迟疑，她笑着埋怨说：“没事的，别害怕啦！”拥抱过后，玛丽亚谈起疫情，言语中略带讥讽：“你不觉得越在意这个病毒的人，反而越容易感染么。你知道吗？我有些朋友，特别紧张，天天用酒精喷这喷那的，最后反而是他们先感染了，其它的人倒是好好的。”我深知玛丽亚的错觉只是出于“幸存者偏差”，然而要驳斥她却并不容易。上文提到的努尔兰，他有一位叫阿里的同事。虽然两人是多年的好友，但对待疫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阿里行事豪放，开会从不戴口罩，逢人便握手。可偏偏这两人当中，努尔兰先感染了病毒，于是，两人的同事私下议论说注意防疫的人反而先感染了病毒。虽然阿里不久后也感染了，但是周围的人早已先入为主，认为防疫是无用的，越是讲究，感染得越快。

最后，医院不要求轻症患者住院，对痊愈患者少回访或者不回访的做法无形中让民众对新冠疫情更添一层偏见，以为新冠只是大号流感，感染了也不过如此。以我室友为例，感染期间，医院并未要求她住院隔离，所住的宾馆也没有采取特别的防疫或消杀措施。她搬回宿舍后，宿管也没有要求她做核酸检测。理论上，宾馆、宿舍都属于公共场所，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新冠感染者或是康复的新冠患者后，都应进行消杀、隔离，然而哈国的工作人员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

一点。凡此种种似乎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感染新冠并不可怕，对工作生活无甚影响。偏见既生，防疫上的傲慢也就随之而来了。

### 三、防病毒流于形式，傲慢随意

回国前要处理的事情陡然增多，迫使我不得不频繁地乘坐出租车，相应地也不得不频繁地提醒司机佩戴口罩。大多数人一经提醒都很配合，然而也有少数让我印象深刻的司机。有一次，司机坚持不戴口罩，理由是自己已经接种过疫苗，我提醒他：“卫生部的官员昨天还特意强调，接种过疫苗的人也要戴口罩，他本人打过疫苗，还不是因为不戴口罩而感染了。”谁知他回了一句：“那是他自身抵抗力差。”在当地像他这样认为接种了疫苗便是穿了“金钟罩、铁布衫”的人不在少数。据当地媒体报导，截至2021年5月19日，全哈二次感染的人数达到了589例，到了7月8日，全哈已有2212名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公民感染了新冠病毒。



图2 “请佩戴口罩”的红色标识后到处都是不戴口罩的年轻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即便是戴了口罩，也有不少人只是将口罩戴在鼻孔下方的位置，着实让人哭笑不得。上文提到戴口罩露出鼻子的儿童医院护士绝非个例，打开哈萨克斯坦的新闻，但凡报道疫情的新闻，画面上总会出现不少戴着口罩却把鼻子露在外面的民众。此外，还有全家出行唯独不给孩子戴口罩的家长；反复摘戴口罩，甚至将口罩揣在牛仔裤里只为应付检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在办公室或大街上等公共场所拒绝佩戴口罩的人……处处透露出民众对防疫的傲慢与随意。仿佛所有的防疫规定都只是政府强加给民众的条条框框，至于为什么会制定这些规定，他们不会去深究，也不想深究。



图3 带着口罩却把鼻子露在外面的水果摊主和顾客  
图片来源：7月19日哈萨克斯坦电视台晚间新闻截图

从2020年3月疫情暴发至今，哈国疫情主要经历了三轮高峰，第一轮高峰期在2020年7月，第二轮高峰期在今年4月，到了今年6月末，Delta病毒攻占哈萨克斯坦，感染人数再次直线上升，哈国进入了第三轮疫情高峰。哈国疫情的变化固然与世界范围内变种毒株的快速扩散脱不开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民众对待疫情的态度。哈萨克人

的春节纳乌鲁兹节过后，天气一天天回暖，各家的婚宴也陆续提上日程。尽管疫情期间政府再三禁止各种形式的聚集活动，但是民众的热情丝毫不减：市内酒店被关闭了，他们就偷偷地转移到远郊的宾馆，晚上警察严查，他们就等到下半夜再大肆宴饮。哈国地广人稀，疫情期间为躲避警察，甚至有人将婚宴转移到草原的毡房内举办。如此藐视病毒，怎能遏制传染？去年5月，楼道里搞卫生的阿姨顶着疫情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婚礼，不久便出现感冒咳嗽的症状，再后来我们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哈萨克语在祝人喜事连连时喜欢说 *Toi toiğa ulassyn*<sup>1</sup>，直译过来便是愿（生活中）一个婚宴接着一个婚宴。与中式婚宴不同，哈国的婚宴上新郎新娘只负责端坐上座，吃饭看戏，真正的表演者是来宾以及受邀的各种乐队。亲朋好友在婚礼上既要载歌载舞还要比赛答题，因此婚宴不仅是他们生活中的娱乐来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交场合。婚宴办得好坏直接决定了双方家庭的脸面。早在疫情前就有举债办婚礼的情况，如此郑重其事，受邀的人自然不好意思不去。尽管政府一再劝阻，然而一旦有人开了头，事情就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起来。就这样秉承着你办我也办，他去我也去的精神，哈国民众硬是让婚宴成了疫情传播的一大源头。

7月是哈国全民休假的时期，纵使 Delta 病毒肆虐，屡破新高的感染人数也没能阻挡民众放假散心的热情。回国后，我与当地好友通了电话，得知系里的老师不是在埃及、迪拜度假，就是在哈国境内参加各种婚礼，不禁替他们捏了一把

1 为了方便读者拼读，本文出现的所有哈萨克语均按照新版的拉丁化哈萨克语字母表拼写。



汗。一位名叫娜塔莉亚·杰尼索娃的博主曾在7月7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哈萨克斯坦不能战胜新冠病毒”的文章，文中描述了疫情下她所在的克兹勒奥尔达市的居民是如何自顾自地参加婚礼、聚集在广场上乘凉游乐的“盛况”。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自嘲地说她所居住的国家“无论发布什么样的禁令，人们总有办法绕过去。”然而，病毒不是人，它既不会收取好处，也不会因为听了几句美言就心慈手软。面对传播更快、毒性更强的Delta病毒，哈萨克斯坦民众自以为聪明的“绕过去”实际上绕过的是保护他们的口罩、疫苗以及条条禁令，这种骨子里对科学防疫的傲慢态度恐怕会让他们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 四、写在结尾的话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戴上口罩呢？有的。回国前我参与编辑的一本书恰逢出版，编辑提议进行一个简短的视频采访，我再三推脱，理由是戴口罩受访效果不好，摘下口罩又有违防疫规定。编辑先是疑惑：“为什么您坚持要戴上口罩呢？您生病了吗？”在我的一番解释下，编辑恍然大悟：“哦，原来您是为了保护自己！那您戴上口罩吧，没关系的。”到了采访的那天，我突然发现整个采访室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上了口罩，与其它部门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采访结束合影时大家也未曾把口罩摘下，出版社其它工作人员看到忍不住劝说：“照相了就把口罩摘了吧。”负责摄影的小哥礼貌地拒绝：“不了，应该要把口罩戴上的。”回国后每每想起当日的情景我心中总是一阵感动，却又伴随着更多的钝痛。

热情好客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宁肯出于礼貌为了我这个外国客人老老实实地戴上口罩，也不肯为了自己的健康认真地执行防疫措施。他们对病毒有着太多的偏见与傲慢，但抗疫不是写浪漫小说，偏见与傲慢不仅无法引向人们所期待的结局，反而会让更多有心防疫的人陷入被动感染的困境，而疫情的传播也只会随着变异毒株的出现而逐渐失控。

不出所料，哈国的感染数量在8月份持续飙升，感染率增加了两倍之多，这回连我那位一向对疫苗持观望态度的外教老师也忍不住将接种疫苗提上了日程。然而她计划了数次，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临阵脱逃。一次她又向我说起要接种疫苗的事，絮絮叨叨分析了一通，末了来了一句：“哎，谁知道呢？让老天保佑吧……”一长串哈语的音节从电话那头密密传来，结尾“森森”两声，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森”是哈语祈使句第三人称的词尾，在拉丁化的哈萨克语中写做“sin”或者“syn”，翻译成中文是“让”——“他想唱就让他唱”的“让”。然而哈萨克语的“让”却常常出现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外教在电话里说的“谁知道”直译过来就是“让谁知道”。这个语法现象曾让我一度费解，现在想来，这种说法仿佛承认了我们不能决定自己能否认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也是有一种更高层面的力量在“让”我们知道。而哈语中的“老天保佑”直译过来也是“让老天保佑”，本来求老天保佑已经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而这个“让”字词尾，无疑让这种无能为力更添一层。除此之外哈语中的“就这样吧”使用的也是“让”字词尾，直译过来是“就让它就这样吧”。“谁知道呢？老天保佑。就这样吧……”合起来写做“Kim bilsin? Qudai saqtasyn. Bola bersin”。没想到这整齐的

“森”“森”“森”结尾竟构成了哈国抗疫的真实写照。重重偏见使许多哈国人民的认知至今仍然未能在正确的防疫手段和不被感染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破裂与他们骨子里的宿命论一旦结合，反过来又会极大地摧毁他们的防疫信念，或许这才是他们面对病毒如此傲慢的真正原因。

注：文中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李音 文字审校：董慧